

第七章 結論

總結本文各章節對於《詩經》中不同類型男性人物形象的考察，撰者將人物形象歸納為以下八大類型，並分別論述其形象如下：

一、神話人物形象

禹在《詩經》中是個善治山水的人物，並成為治國者的典範，詩中君王常將「禹」之善治山水功績，掛在嘴邊，並順勢引出自己的功績，頗有「神主牌」的作用，但未明言「禹」是夏之開國國君，然而在《國語》、《山海經》、《淮南子》、《楚辭》、《史記》等書，卻肯定其為君王之身分；另一神話人物—后稷，在周人的心目中，不僅是他們的始祖，安養眾民的英雄，更是天神的化身，《詩經》中描寫后稷遭棄的經過：「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這種神異的形象非常鮮活。

二、周先王人物形象

從考察〈大雅·公劉〉詩中描繪公劉率眾遷豳的形象，及〈行葦〉詩中一再讚美公劉的仁德，撰者認為詩人將公劉形塑成具有忠實篤厚的特質、高瞻遠矚的思維、堅毅不拔的精神、精明幹練的能力、仁德思想的君主；而古公亶父（太王）的主要建業是遷岐而奠定了王業之基，這過程中，他不僅建立家室，使人民安居立業；建立宗廟，使祖先得以享祀，繼而保佑子孫；建立大社，使土神保護眾民；建立宮室，樹立權威，就連戎狄都嚇到遠遁，此外，還任用賢臣、委任官吏，使其適才適用。而《史記》、《孟子》、《莊子》、《呂氏春秋》、《尚書大傳》、《淮南子》以及《吳越春秋》等諸書也提及太王遷岐，乃因戎狄貪得無厭，先欲財貨珠寶，最後連豳地人民賴以生存的土地都不放過，強調太王本著仁慈愛民之心，而不與之戰，實因不忍族人為此而受害，遂一讓，再讓，三讓，終為避狄而從豳地遷居於岐山周原，也因此奠定太王在豳地人民心中是位仁人君主的形象，考之諸書所言，而得古公亶父是位為周（文王）之興起奠下萁路藍縷之功、肇王業之績，仁

慈愛民，不尚暴力的仁人君主。另一先王—季歷（王季），在《詩經》中一再強調王季之德，而其美德不僅是個人修身的私德，更是能夠造福百姓，大公無私的美德。是以，王季除了能友愛兄長，勤政無私，篤於行義之外，還是位能符眾望，使人民近悅遠來，上下親附，具備九德的賢君。

三、周王人物形象

考察《詩經》及《史記》等書中有關文王形象的描繪，文王是位事親至孝，祭祀敬謹，做事勤勞的人，而且濟弱扶傾，視民如傷，設立有司，舉用賢能，武功彪炳，是位仁德兼備的賢君；除此之外還具有威嚴的祖先神形象，能夠庇祐子孫，又能產生儆示的效果，使子孫們戰戰兢兢以承續得來不易的王業。武王則是位雄才大略的君王，能先營建鎬京，以安子孫；而牧野之戰，弔民伐罪，具有威武形象，並完成自太王以來的「翦商之志」；在戰後能敬告祖先，撫恤人民，並採取偃武修文的策略，是位能承文王之緒，又開百世之功的明君。成王則因自幼即位，剛開始懷疑周公的忠誠度，不欲迎之，但經誤會冰釋後，頗能虛心受教，且成王認知天命之不易，敬天法祖，欲續緒文武之業，故夙夜匪懈，黽勉政事，恭敬戒慎，重視稼穡，祭祀合禮，威儀合度，諸侯臣民悅服，澤及四海，所以，成王之世，呈現政和年豐之氣象，也成就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治世。厲王則因親近榮夷公，與民爭利，又暴虐無道，師心自用，手段相當兇殘，狂妄無知，是位拒不納諫的暴君形象。至於宣王的部份，《詩經》中形塑宣王早年勤勉政事，能安定民心，攘除外患，任用賢能，南征北討，大展軍威，是位中興君主的形象；但因德之不純，在《國語》、《史記》等書中則記其晚年不籍千畝，立戲太子，料民於太原，誤殺杜伯等失德敗禮的形象，所以，綜觀宣王一生，是個毀譽參半的君主。而幽王則是位典型的昏君，不但對於天災示警視而不見，還昏庸淫逸到任用奸佞，聽信讒言，喜怒無常，敗壞禮法，以致諸侯不朝，又嬖褒姒，黜申后，廢太子，實為一失德無道的亡國之君。

四、諸侯形象

在諸侯的部份：有留寓於衛，仰人鼻息，不知奮起的黎侯，他在《詩經》中

是一副失權落魄的模樣。還有貪色淫蕩，強納子妻，如鳥獸醜行，最後更不擇手段，令盜殺子，陰險凶狠，六親不認的衛宣公。也有淫欲昏心，淫行無忌，毫無禮義，不但淫乎其妹，還盛服與文姜相會的齊襄公。另有初期尚能整頓內政，開疆闢土，為晉文公稱霸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可惜晚年卻寵幸驪姬，廢嫡立庶，好聽讒言，最後弄得家毀人亡的晉獻公。更有視體統為無物，宣淫無忌，與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還公開四人行為的關係，並以此相戲謔，毫不掩飾醜行的陳靈公。

五、典型人物形象

《詩經》中所描繪的典型人物是血肉豐滿，栩栩如生的，例如：獵者的形象常是體魄健美，而且才德兼備的，在射獵技術方面之高超，可以「壹發五豝」，「壹發五豮」，駕馭能力表現更是優秀，可以「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而且藝高人膽大，可以「禴褻暴虎」；另外內在品德方面，則更是表現出「美且仁」，「美且好」，「美且武」，「美且鬻」，「美且偲」，總之，不是空有技術的魯莽武夫，而是能相揖為禮，具有由內而發的仁德，是內外兼美的獵人。

而讒佞之人的形象更是鮮活，在〈小雅·巧言〉詩中詩人稱讒人是「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巧言就像是鼓簧那麼悅耳動聽，所以，讓人喜歡聽，易接受而難有防備，而讒佞之人臉皮之厚，簡直已到忝不知恥的地步。而〈小雅·巷伯〉一詩，則指出讒言可怕的地方在於：「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哆兮侈兮，成是南箕」，讒言交織，能無中生有，還用巧言羅織人入罪，而他的嘴巴大得像南箕星一樣，一開口就是要害人，〈小雅·青蠅〉一詩，更以青蠅喻讒人，言讒言擴散之快，為禍之大，詩中將讒佞之人的形象描摹得維妙維肖。

而有關《詩經》中隱逸詩的隱者，大約可分為兩大類：其一、是欲隱居之人，如〈魏風·十畝之間〉，〈邶風·北風〉等即是；其二是已隱居之人，如〈衛風·考槃〉，〈陳風·衡門〉，〈小雅·鶴鳴〉等。《詩經》中的隱逸之人，又可分為兩大類型，其一是積極樂觀型，對於隱逸生活甘之如飴，無怨無悔，如〈衛風·考槃〉，〈陳風·衡門〉，〈小雅·鶴鳴〉等詩篇；其二是消極被迫型，因為外在環境

所致，被迫歸隱，心中有些許的徬徨、苦悶及無奈，如〈魏風·十畝之間〉，〈邶風·北風〉等即是。因為隱居的目的不同，隱居的背景不一樣，所呈現出的隱逸形象及心情也大不相同。是以，在〈魏風·十畝之間〉篇中所呈現的是一位亟欲尋求心靈的解放，想過悠閒自在隱者生活的詩人；〈邶風·北風〉詩中所寫，則是位因姦邪當道，國是日非，徬徨無助，乃思與好友歸隱田園的隱者；〈衛風·考槃〉一詩，則是述一位隱居山水，隨遇而安，悠遊自得的快樂隱者，詩中從隱居之所，隱士之人格特質，隱者的生活型態，隱者之志等多方面來呈現；〈陳風·衡門〉一詩，則是描寫一位安貧樂道，無求無欲，自樂的隱者；至於〈小雅·鶴鳴〉一篇，則是位有令聞德誼，能成君之德業的隱者，所以，即使歸隱，仍聲聞于天。《詩經》中對隱士形象的刻畫頗能遺神取貌，除了對於隱居處所的描繪，隱者令聞的稱頌之外，最重要的是透過這些描摹，能深刻呈現出隱逸之人的內心世界。

而憂國憂民之人的形象，因為有感於國家的動亂不安，國君無道，而引發內心的憂慮或發出沉痛的呼籲，欲喚醒人心，以求有助於國家，而非為凸顯個人之憂，為「感時憂國」的意味，是一種動人的大我之愛。《詩經》中有多篇這類的作品，其時代背景大約在西周末年以後，有志之士見國家動亂，本著忠厚愛國之心，只能深自惕勵，不敢稍有安逸之心，除了〈王風·兔爰〉一詩，有積極奮起之意外，大多是承受著道德的焦慮，滿懷憂懣，欲救無從，欲振乏力，孤軍奮鬥，難敵大勢，只能眼睜睜見周室日漸衰微，或呼天訴之，或歌以遣憂，或期待救世主的出現，然周室衰亂至此，亦莫可奈何。

至於心有怨嘆之人的形象，相對於憂國憂民之人而言，憂國憂民之人是爲了國家人民而憂，心有怨嘆之人則是爲了個人不得意而怨，是以《詩經》中述心生怨嘆之原因甚多，或因仁而不遇，或因始終待遇不同，或因勞逸不均，或因積勞而怨，或因行役在外，不得侍奉父母，或因為公事繁忙，處境維艱，還不爲家人所諒解等，皆使詩人心起怨懟而深嘆之，而怨嘆者的形象，多是爲國家盡職盡忠，勞心勞力，卻反受陷害，不被賞識，不被諒解，或行役在外勞逸不均，同酬不同

工，內心不能平衡，積勞成怨，而怨天、怨地、怨祖先。

六、「彼其之子」形象

「彼其之子」多為負面形象，例如：在〈王風·揚之水〉中是個權大勢大的形象，就連周室也差使不動他，拿他沒辦法；在〈鄭風·羔裘〉中是個德不稱服的形象；在〈魏風·汾沮洳〉中是個過度打扮，只管個人，一點都不關心民間疾苦的貴族形象；在〈唐風·椒聊〉中是個勢力龐大足以威脅君王的貴族；在〈曹風·候人〉中則是個尸位素餐，德不稱服的形象。

七、「君子」形象

在有關「君子」的詩篇中則以讚美居多，詩人常以「有匪君子」、「淑人君子」、「豈弟君子」、「假樂君子」稱之，或以「樂只君子」、「君子樂胥」、「君子萬年」頌美之，或從君子服飾車馬之盛以稱其德，或從君子之善治國、能用人、能安邦來著筆，而其言談舉止是幽默風趣，得體但不過分，分寸拿捏得很好的，言談之間，流露出落落大方，和藹可親的樣子，和他相處非常自在舒暢，是個有威儀，言語有序的有德君子，其氣質、儀態、涵養更是和順、敬謹，不倨傲的。總之，《詩經》中的「君子」給人一種自在舒暢、快樂又和易的感受，凡事都能以禮為依歸。除此之外，有德的君子是不忘本，能敬天、能法祖的，所以，能承受天命，受到上天的保佑及反覆眷顧，而神明也都願意受饗，因為能敬天，天不怒，不降災，便能使國家長治久安，故詩人樂於稱頌之。

八、群體形象

在王會諸侯圖的部份，〈小雅·車攻〉所呈現出來的是軍隊的紀律嚴明，軍容整肅、聲勢浩大，以及高度戒備的行軍活動，詩人藉此來表現王者之師的氣象，詩中相當重視天子威嚴的形象，再加上鋪陳嚴肅的氣氛，而構成莊重雍容的畫面，其目的都是為了表現出宣王中興的氣象來。

在田獵圖的部份，具有較高的娛樂性質，不管是〈秦風·駟驥〉，或是〈小雅·吉日〉詩中，詩人在描述射獵的場景時都集中在秦襄公、周宣王等二位君王身上，而參與者的態度都是愉悅而不是嚴肅的，所鋪排出來的氣氛是和樂而不是

肅殺的，所以，當射獵活動結束之後，在〈秦風·駟驥〉詩中有輕鬆的遊園描述，而〈小雅·吉日〉篇中更是以君臣和樂共飲的畫面作結，充分展現君子之德。

在祭祀圖的部分，誠如王質所言：「大凡詩人言祭祀，必以農事起辭，言農事，必以祭祀續辭，言農事祭祀，必以福祿結辭，三者未有闕一者也。」¹〈小雅·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詩，都符合此一規律。雖皆以農事開頭，以祭祀續辭，以福祿結辭，但因祭祀目的不同，其所呈現的畫面也不盡相同，即使〈楚茨〉、〈信南山〉都是王者祭祀宗廟之詩，但二者之寫作風格並不相同，姚際恆曾說：「上篇（〈楚茨〉）鋪敘閎整，敘事詳密；此篇（〈信南山〉）則稍略而加以跌蕩，多閒情別致，格調又自不同。」²從內容上來看，〈楚茨〉篇詳敘祭祀儀禮典制和祭祀活動的情形，而〈信南山〉對這些卻寫得極其簡略，詩人的重點似乎不在寫祭祀諸事來表明對先祖的崇拜和誠敬，而是更注重祭品之豐盛及「因祭祀而推原粢盛所自出。」³故〈信南山〉一詩所呈現的祭祀風貌自與〈楚茨〉不同。而〈大田〉一詩，與〈甫田〉大同小異。此二詩，雖都為豐年而祭祀，但〈甫田〉是先祭祀而祈豐年，而〈大田〉則是因豐年而祭祀。〈甫田〉是君王祈豐年祭祀之詩，側重寫君王的省耕、祈年、大穫，故從王者一面盡力描摹，所以，〈甫田〉「詳於察與省，而略於耕；此篇（〈大田〉）詳於斂與耕，而略於省與察」。⁴在人物形象的部份，參祭者方面，有大夫威儀有容，廚師的敬慎敏捷，君婦的敬謹，尸、祝、田官的各擅其職，在在呈現堅守禮儀法度的形象，表現對神的敬意。而在君主形象部份，〈楚茨〉一詩所呈現的君主（主祭者）形象是恭敬敏疾而又合法度的形象；〈信南山〉是謹慎守成又感恩的君主形象；〈甫田〉是親民愛民、受民愛戴，有德的君主形象；〈大田〉則是無私的、有仁愛之心的君主形象。形象雖稍有不同，但其對神的恭敬誠意之心卻是相同的，所以，都能享有神所賜予的大福。

¹王質：《詩總聞》，卷十三，頁 254。

²姚際恆：《詩經通論》，卷十一 頁 233。

³方玉潤：《詩經原始》，頁 930。

⁴方玉潤：《詩經原始》，頁 943。

在宴飲圖的部份，則將周代的禮樂文化發揮得淋漓盡致，詩中常有音樂的演奏，並藉此營造和樂的氣氛，在這十二首宴飲詩中，除了在〈小雅·頌弁〉詩中表現出比較灰色的思想，強調及時行樂的觀念，以及在〈小雅·賓之初筵〉詩中有醉酒失禮的描繪之外，大體而言，宴飲的氣氛是和樂的，過程是和諧有禮的，主人熱誠的招待，賓客熱情的回應，並透過音樂、舞蹈、美酒、佳餚、射箭，來呈現賓主盡歡的畫面，主客雙方在杯觥交錯中，感情互動交流，特別是因為主人熱忱的款待客人，客人發出了由衷的讚美，最後則在一片頌禱聲中結束，充份體現了周代諸侯與天子之間的和睦關係。此外，不管是君臣間的宴飲或兄弟間的聚會，都顯示出周人對於倫理觀念相當的重視，詩中有祭而飲的尊老，燕而射的重德，或「先諸父而諸舅」、「先諸舅而後兄弟」，強調親疏、尊卑之分，這都反映了周代貴族相當重視倫理關係的文化內涵及其生活樣貌。

另外，《詩經》中對於男性人物形象的塑造，舉凡從男性人物的內、外在來描寫，或是從環境、氣氛來烘托，或是運用想像、比喻、側寫、反覆吟詠、對比等手法，這些形塑技巧對於後代小說、戲劇等文學作品的確產生了很深的影響，其生動的形象語言，充滿了表現力和感染力，這也是《詩經》能夠感動人心、引起共鳴的原因之一。

撰者考察其男性人物形象的描繪，更發現《詩經》男性人物形象充分反映周代獨特的政治、文化內涵。首先在政治上，周人崇尚天命的觀念，以及對人民非常的重視，周人還體認到一位優秀的領導者應以服務型或德式型的領導哲學來領導人民的，如此可使人民完全信服，並且強調領導者需具有敬天的思想，要有保民安民的作為，以及要能任用賢能等領導策略，這些都是周代政治的特色。然而，當周人政治統一後所帶來的卻是文化上的統一，而周民族的歷史價值，不僅是表現在政權上的統一，更是在政權統一的背後那股深層文化的力量，因為它在無形中影響著周民族的盛衰。是以，撰者考察周文化所呈現出的內涵是以「德」為貴族該有的風範，所著重的是修德以來遠人，強調從統治階層切實做起；而以「禮」作為規範貴族的行為，使禮成為周文化的核心價值；最後則結合個人的修德，而

在貴族社會群體實踐的禮儀中，來呈現個人和樂的氣質、中和之道及群體和樂的氣氛。所以，「和」所代表的是個人與自己內在的和順，也是個人與群體之間的和諧，更是人與天之間的協調統一。「德」、「禮」、「和」三者，撰者將其視為周文化歷經點、線到面所擴散與整合出來的文化內涵。

除此之外，撰者在研究的過程中發現：《詩經》文本還具有文獻史料的價值，可以透過《詩經》人物形象的描繪來補史籍之不足處，另外，對於與《詩經》文本有關的史料則可作為研究《詩經》的本事。而有關史料接受與詮釋的課題，撰者認為此一課題相當值得學者重視，尤其對於「接受學」與「詮釋學」的認識與了解，除了有助於研究的過程中能夠對於史料有更深刻的探討外，也可藉此分析作者與史料的關係：當時為什麼選擇這些材料？又為什麼做了這樣的詮釋？此與作者本身有何相對密切的關係？同一時代，不同的作者為什麼會有不一樣的詮釋？不同的時代，面對相同的史料，為什麼也有不一樣的詮釋？而讀者是不是又是另一個詮釋者？這些都是相當值得研究探討的議題。但本研究中礙於研究篇幅的限制，故僅提出個人小小的見解，或許可以用「《詩經》的接受與詮釋」為題，作為未來繼續研究的目標。